

## 汉语音节的教學接口：蒙學經驗及其對泰教學啟示

謝友中<sup>1</sup>

梧州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付福珍<sup>2</sup>

賀州學院，教師教育學院

李紅梅<sup>3</sup>

泰國農業大學，人文學院

Email: 664928613@qq.com

Received: June 6, 2025; Revised: November 4, 2025; Accepted: November 10, 2025

### 摘要

漢語音節是對泰中文語音教學的核心，而以顯性拼音知識應用為特徵的教學接口趨於走強，減弱了教學接口的強弱彈性，影響了教學效能。歷史地看，漢語音節的教學接口是逐漸走強的，過強以後則有必要回調以創造更加靈活的理念與操作空間。蒙學教材《千字文韻》作為音節弱接口教學的典型，創設了以聲調切入音節的教學模式，同時巧設形式遷移教學內容，以及難易音節的分級與教學順序的非對應處理，都較好地解決了隱性音節知識弱接口的教學抓手難題。這種獨特的弱接口教學模式，不僅得到了現代理論的有力支持，更給漢語音節教學接口的弱化回調提供了極具針對性的模式補充，至今仍具較大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對泰漢語；音節教學；《千字文韻》；顯隱性知識；接口策略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明清吳方言韻書文獻的整理與音韻比較研究”（19YJC740095）；廣西新文科項目“面向東盟中文需求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新文科人才培養探索與實踐”（XWK202428）。

注：2, 3 為通訊作者。

# THE TEACHING INTERFACE OF CHINESE SYLLABLES: THE EXPERIENCE OF MENGXU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AI-CHINESE TEACHING

XIE YOUZ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Wuzhou University,

FU FUZHEN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Hezhou University

LI HONGMEI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teaching interface of Chinese syllables is the core of teaching Thai-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the teaching interfac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explicit phonetic tends to be strengthened, which weakens the elasticit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rength of teaching interfaces and brings about the problem of reduced teaching efficiency.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interface of Chinese syllables has gradually become stronger, and after it becomes too strong, it is necessary to call back to create a more flexible teaching space. The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Qianziwen Yun,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weak interface teaching of syllables, creates a teaching mode of starting from the tone to the syllable, and at the same, it skillfully sets up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formal migration, and the grading of difficult and easy syllables and the non-corresponding treatment of the teaching order, which perfectly solves problem of the weak interface teaching handle of implicit phonetic knowledge. This unique weak interface teaching mode, which not only has the strong support of modern theory, but also provides a highly model supplement for the call back of the interface of Chinese syllable teaching, still has great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Thailand; Phonetic Teaching; Qianziwen yun; Explicit-implicit Knowledge; Interface Strategy

## 1. 引言

汉语音节是国际中文语音教学的核心，习得音节是二语者拥有汉语交际能力的前提（刘英林与马箭飞，2010）。原国家汉办研制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首次划定了 1206 个音节的精准教学范围，然而教好这些有限的音节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以拼音的显性知识切入汉语音节教学的效率难题始终存在（吴峰，2019），凸显了音节教学的接口困境。

人们把外语教学中的语言知识分为显性和隐性两面，并由此产生了二者的接口假说。这源于英籍匈牙利学者波兰尼等人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提出的概念，应用于语言教学领域，一般认为，显性语言知识指的是能够表达出来的语言规则，隐性语言知识是指母语者无法言说的具身语言规则（唐旭东，2020）。理想的外语教学则希望二语者达到隐性语言知识的水平。在显性知识的教学应用上，则有 Krashen 无接口，DeKeyser 强接口，以及 Ellis 的弱接口三种假说（陆军与王乃兴，2018）。该假说认为，接口策略极大影响教学效率。学者运用这一理论考察一些国家的汉语教学后发现，过于强调某一接口都可能带来教学模式的僵化（袁芳远，2017）。汉语音节教学是典型的显隐性知识的接合，这在对泰汉语语音教学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泰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来，两国商贸往来更加密切，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泰中双语人才。据笔者走访在泰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了解到，目前已有 3000 余家在泰中企，泰中双语人才供不应求。加强教学接口研究是顺应二语市场提高教学效率、节省学习成本的迫切要求。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层面的努力，从教学上看，则需进一步提升教学效能。然而据学者观察，教学端普遍存在语音知识介入过多反而引起口说汉语教学效能减低等问题（张冬雪，2021），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的期待，也正反映了提高教学接口强弱弹性的重要性。

有关汉语语音教学，泰中两国学者都比较关注。泰国期刊网 ThaiJO 平台上已经发表了系列语音教研相关论文（周正与陈玉琳，2025），中国知网也不断有相关成果发布，其中不乏大量汉语拼音知识的教学探索，但是学者指出总体还处在经验摸索阶段，科学性有待提升（冯海丹，2022）。泰中两国学者的研究从教学接口上看，总体是强接口理念下的探索。普遍观点认为，汉语音节教学对拼音知识的依赖，古人是这么教的，今人也只能这么教（李如龙，2015）。然而反思之声也随之而起，比如拼音知识介入过多容易引起教学低效等（苏映仪，2025）。赵金铭（1985）早就指出，古代音韵学的二拼发展到现代的四拼，越来越细致反而不利教学，需要回归传统。杨绪明（2023）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拼音教学需要简化。这些反思都揭示出显性知识过强接入并非是教学的便利之举。

还有学者主张教学接口上进一步弱化回调至整体音节。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这一教学理念（吴峰，2019），这是减少拼音知识使用而走向弱接口的表现。史冠新（2015）强调，“非音节不予示范”，全部采用“直读法”。然而作者也指出该法碰到了整体音节教学存在“使用什么声调的问题”，在接口调弱后又遭遇到新的瓶颈。不难发现，教学接口过强已引起了学界反思，而调弱则又有新的难题，形成了强接口“弊端凸显-弱化回调-整体理念-仍存难点”的教学困境。

上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源于对蒙学教育史的误解。如前文所指出的强接口模式中，从古代蒙学那里寻找依据，显然对古人有些误解。中国古代确实在汉末就发明了声韵拼合的反切法知识，直至后来音节分析知识浩如烟海。然而这属于音韵学范围，与童蒙音节教学还不是一回事。今人可能是把古人的音韵学研究嫁接到了教育领域的童蒙教学上。至于弱化派的声调处理难题，古人可能也已经探讨过。母语儿童语言习得对二语教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闫长虹与王敏，2019），传统蒙学教材是重要的母语儿童语言习得资料，从中发掘蒙学经验对回应有关历史误解，给强接口观念松绑，给弱接口探索提供更多借鉴都有重要意义。

古今汉语音节结构一致，今人面临的教学接口难题古人也同样经历过，在汉语音节教学遇到接口困境的情况下，以往的历史经验或许能带来新的启发。而且传统教学资源也一直在滋润着泰中两国的汉语课堂。学者指出《三字经》《百家姓》蒙学经典等也曾经是泰国汉语课堂的通用教材，将蒙学经验运用到泰国汉语课堂并取得了积极成效（汪周坤，2019）。不论是历史传承，还是应对当前的教学困境，都十分有必要从传统教学资源中发掘智慧。

本文将在回顾古今汉语音节教学接口演变的基础上，就有关教学接口的误区提出新的看法，并以蒙学教材《千字文韵》为例，运用现代理论分析其弱接口教学的合理性，进而发掘其独特的弱接口音节教学模式，以补充当前有关汉语音节教学接口研究的不足，为改进国别汉语语音教学提供借鉴。

## 2. 汉语音节教学接口的古今演变

汉语音节教学经历了长期的由古代弱接口发展到当代强接口的演变过程。汉语音节在古人那里也是教学的核心，当回顾历史上针对儿童的汉语音节教学时，我们发现古人并非主要采取声韵拼合知识有力介入的强接口模式，而是较为普遍采取音韵知识介入极为有限的弱接口模式。古代对汉语音节知识的研究，与针对儿童的汉语音节教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领域界限较为明显。从古人对汉语音节研究的目的、音节结构的定名以及蒙学音节的基本教学法等方面看，古人对于汉语音节的研究与教学分属语言学与语言教学两个领域，而在教学方面弱接口特征明显。

首先，古人对汉语音节构成的揭示和研究主要为了读经与文学创作目的。汉代末年发现声韵结构并创造反切法知识，后来在经书注解中广泛使用；韵书对汉语音节的分析及其知识体系则主要服务于隋唐以后的文学创作、汉语音韵研究等。站在蒙学的角度看，古代关于汉语音节结构的研究所形成的知识系统是高深的学问，也不大适宜直接用来进行童蒙教学。

其次，古人关于汉语音节结构的定名纷繁且不在同一个时代，客观上也给面向童蒙的音节教学带来了名称使用的困难。比如《广韵》有 206 个韵，显然不可能是 206 个韵母；声母方面则是到了唐代才有用汉字命名的三十个字母，宋人定名了三十六字母，明代《早梅诗》则是二十个声母。由此可见，音节构成的名称复杂且不断演变，不方便直接用来进行童蒙教学。

最后，从语言教学法上看，声韵结合的反切法知识也并不常在童蒙教学中使用。如“东，德红切”，原理上与今天的拼音一致，实际上从教学的角度看则有天壤之别，

“德”“红”二字并非声韵母的名称，具体到每个反切上下字是不固定的，它的语音内涵需要意会而很难言传，更不易向童蒙讲清楚。就已发掘的蒙学杂字文献看，蒙学音节教学使用最多的则是韵语法和直音法。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古人汉语音节的研究知识非常丰富，但不代表能够直接接入童蒙教学。这还不只是音韵知识复杂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则是古人对蒙学规律有其独特的把握。比如后文将要讨论的案例中，古人早就指出显性知识对于童蒙是“难经口授”的，也就是古人倾向于弱接口教学。一些对泰汉语教师发现，学生“需要区分记忆哪部分是声母，哪部分是韵母”的知识是绕弯子（张冬雪，2021），这可以说古今人在汉语音节教学上有所默契。今人熟知的强接口模式在《汉语拼音方案》颁行后逐渐固定下来，引领了汉语音节的教学方向，为汉语教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拼音知识在教学上的应用也一直是学者探讨的重要话题。史冠新（2015）指出今天的拼音教学受到了传统反切法的影响，这是正确的。但其未进一步指出，这是受到了传统音韵学知识的影响，而非主要源自童蒙教学。

在接口过于走强后，反思之声随之而起。从语言交际上看，声、韵母并不作为独立的交际单元。母语儿童就不用经过这样的过程而是直达音义结合的言语音节的。因而在学者看来，汉语音节一气呵成，拆分音节不但增加了显性知识，还破坏了言语音节的整体性（吕必松，2008）。史冠新（2015）等明确强调调弱接口的整体音节教学，不过又遇到了如何接入声调的困境。强接口有着极强的音韵学史支持，弱接口也有儿童语言习得规律的依据。这正反映出教学接口的历史发展性、非绝对性。我们需要思考的则是如何给过强的接口松绑？如何给突破弱接口瓶颈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从而给强弱接口的教学拓展更加灵活的适用空间？哪怕以现代教学理论衡量，蒙学经验也仍具有极强的借鉴价值。

## 4. 《千字文韵》的弱接口教学模式

音节教学接口走强后弊端日显，调弱呼声随之而起，这可以看作是接口规律发生作用的自然表现，但是汉语音节教学弱接口的有些理论问题尚未真正解决。史冠新（2015）的弱接口模式就遇到了如何处理声调的难题，而这在本文看来恰恰是必须突破的方向。童蒙语言习得资料《千字文韵》极为突出的声调接入模式，从现代教学理论看也是非常合理的。同时，编者巧用形式迁移教学内容以及难易音节教学顺序的处理策略等，都显示出了弱接口的模式智慧。这种接口模式恰好对于突破已有弱接口研究的瓶颈提供了针对性的卵榫关系式补充，有助于缓解前文所称的困境循环。

### 4.1 《千字文韵》声调弱接口的理论依据

古人并非故意忽视显性音韵知识的接入，只不过接入的程度和视角与今人有所不同。古人比较重视由声调接入音节，将显性音韵知识的使用调弱到最小化。其音节教学接入可以分为部分式和整体式两种。部分式是截取音节的后半部分，以服务于诗文押韵的需要。整体式则是像本文所讨论的《千字文韵》服务于雅言音节的教学需要。不管哪种模式都强调由声调接入音节教学。《千字文韵》采取以声调接入的整体音节教



学模式，今天来看仍有比较科学的理论依据。

《千字文韵》的整体音节教学模式是以声调为纽带，运用声调能够形成抑扬顿挫的韵律美感作用切入音节教学。其“天腴填铁”这种人造韵律的设计形成了一种利用声调规律的弱接口模式，对于音节知识的应用显得极为“吝啬”乃至不进行呈现。如果说利用了显性的语音知识，则只在教材的开头有一首传诵已久的《四声歌》：“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升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其实这首诗只是一种声调韵律感的描述而已，并非声调本质的知识。编者明确指出，童蒙的“韵调”教学“难经口授”，表明其认识到以音韵知识强势接入的困难，因而仅以比较感性的四声描述切入教学。

这种强调音节声调作用的教学模式能够得到现代研究的有力支持。在汉语音节的感知特点上，学者发现汉语音节内部音素的关系极为紧密，浑然天成，而音节之间的关系却比较松散甚至到了彼此隔绝的地步（王洋与张琦，2023）。史有为（2019）进而指出，这种感知首先在于声调发挥了作用，它就像框箍能够稳稳地将每个音节框起来，有利于听感区分。另外，河野守夫（2001）还发现，听者的语音加工单元是整体一次性的，而非先分析结构之后再组合。研究者还进一步提出感知单元是二语者瞬时加工一个根本特征（李静宜，2022）。这些现代的研究均表明，声调对于音节具有牵引作用，由声调接入是一个以简驭繁的接入路径。

从汉语音节带声调的特点，以及感知的整体性这两个角度看，古人抓住声调接入整体音节教学，显示了对汉语感知单元的准确把握，这为编者设计出教学弱接口“一见即解”的雅言音节教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 4.2 《千字文韵》弱接口音节教学的体例

弱接口不等于教学模式的简陋或随意化，反而更需要简洁而智慧的形式设计，编写体例就发挥着重要作用。语言教材的体例是否合理直接影响教学效能，科学的体例具有经典的教学指导价值（张美兰，2022）。《千字文韵》在编排体例上从宏观的教材开发、中观的内容组织和微观的音节感知层面，对于如何由声调接入音节实施弱接口教学，进行了巧妙的接口设计。

宏观层面，该教材利用了《千字文》原来的隐性韵律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千字文》语言的韵律感加上故事性，避开了显性语言知识的应用，形成了可读性极强的蒙学读本。尤其在语言形式上，原本的押韵就已具有抑扬顿挫的调韵美感，而且在韵脚字上使用了多个常见的雅言韵段。这为整体雅言音节的教材开发提供了便利，即不需要在显性知识上多说，就能快速接入音节教学内容。

中观层面，不用声调术语知识而是使用特定格式给原来千字的声调定位。编者并不直接告诉童蒙每个字的声调知识，而是巧设格式，以显性格式带出隐性知识。如“鸣凤在竹”这句话的四个字下面分别列出了“鸣皿命觅”“封捧凤福”“裁在载截”“中塚重竹”四组小字。不难发现原文四个字分别对应平、去、上、入四个音节。参照清代的北方官话音系（黄雪晴，2015），“鸣”平声、“凤”去声有当时的口语基础，童蒙极易辨别。而“在”字上声、“竹”字入声可能就缺乏口语基础，需要反复感知。通过巧设易懂体例对音节的声调进行定位，既隐藏了显性语音知识又便于诵读感知。

微观层面，以有意义的形式呈现音节教学的重难点。《千字文韵》以声调切入雅言

音节，着重从语言比较的角度提示了雅言声母和韵尾两大教学难点。

在声母方面，提示学习者口语中已经发生了平声浊声母字调分阴阳和上声浊声母字变去声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四字格中需要重新回到雅言的标准。“堂”字是雅言平声浊声定母字，已变为阳平，在其下四字格“堂荡宕铎”中仍归雅言平声，不分阴阳。第二个“荡”字也属于雅言浊声定母字，而在当时已演变为去声，但是在这一格式中仍然放在上声位置，表示其仍属雅言上声。

在韵尾方面，入声在当时官话区普遍消失，是童蒙习得的最大难点，但是编者仍提示其所在的入声位置不变。如“日”字是入声字，“仁”字头下“仁忍任日”，“日”字头下“儿耳二日”，都将“日”字放在入声的位置上，前者是正常的雅言四声搭配，后者则显示入声“日”字与阴声韵的“儿耳二”在口语中可能混同，但是雅言仍归为入声。

以上都表现出在四声韵律的牵引下，设计者并不强调显性知识的介绍，而是巧设有意义的形式，将音节教学内容“框定”在形式中，“倒逼”学习者由形式感知内容，而非先入为主的知识说教。

### 4.3 《千字文韵》弱接口的教学顺序

不论是针对童蒙的雅言音节教学，还是针对外国人的二语教学，客观上都存在教学内容的难易。学者们在减弱教学接口的理念下，对音节进行难易区分并化简拼音系统。赵金铭（1985）、杨绪明（2023）等都曾设计了简化音系方案，表现出对强接口模式的适度弱化。而史冠新（2015）则调整到弱接口后将音节分为难度递进的四类，这些方案本质上都是由易到难的教学思路。然而对于难易音节的教学顺序，古今则有同有异。

相同的一面，是对音节教学内容的难易有所区分。以赵金铭（1985）设计的简化音系作为参考，我们发现古人亦有这样的教学内容处理。赵金铭（1985）的设计分为基础音系和派生音系，基础音系被认为是容易的部分，而派生的则被认为是较难的内容，对于派生的部分则需采取以易带难、容忍差误的策略。比如基础声母 g 与“根韵母” a 系 an、ang 这样的开口韵母相拼属于容易的内容。对照发现，《千字文韵》的声母 g 与 a 系韵母相拼大约 20 来字，罕见不合雅言的现象。如“岗，岗吭钢各”的排列即符合雅言的规律。

对于较难的“派生”韵母，编者并未强行规范雅言的读音，而是“将错就错”按照近似音编写。《千字文韵》中基础声母 g 与派生韵母 iang 相拼时就出现了韵部混同，“薑，薑讲降觉”，“薑”属阳韵，“讲降”属江韵，二者雅言韵部不同，编者却使用了近似的韵部。同时又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维持雅言系统，“禽，禽噤矜偲”这样的四声串联，就保留了 -m 与 -b 韵尾这种实际可能已经消失但是仍属雅言的韵尾配对。这表明，对于难学的韵母，古人采取近似音的办法，并未强行要求逢错必究，这与今人划分难易音节的思路是一致的。

不同的一面则是，今人的由易到难不仅是音节教学内容，也是教学顺序。这在教学上也很好理解，既然内容由易到难，教学上自然也应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然而，对于汉语音节的教学可能有其特殊性。今人不论是赵金铭（1985）的简易音系设计，还是史冠新（2015）将音节排列为由易到难的四个梯度，所设计的方案即是内容顺

序，同时也是教学顺序。古人则不同，其难易音节在教学内容上有区别，但是却并不在教学上体现出严格的先后顺序性。也就是说，古人将难易的音节混合在一起教学，这可能不只是受到《千字文》本身的体例限制问题。就常识来看，古人似乎也有其道理，母语儿童学说话时，会先说“哥哥”后说“姐姐”吗？在今人看来“哥”属于基本音节，而“姐”属于派生音节，显然难易的教学顺序过于严格可能也有些问题。古人对于汉语音节的教学顺序等方面的设计仍有极强的启发意义。

## 5. 《千字文韵》的对泰语音教学启示

汉语音节教学的接口方式既是国别汉语教学的个性问题，也是共性的教学理论问题。对《千字文韵》进行分析后发现，其将声调作为音节的接口、注重形式设计的内容迁移价值，以及音节教学顺序的独特理念，正好切中了今人弱化接口遇到的教学难题。这为对泰汉语相关教师等教学主体，在音节教学方面提供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理念借鉴，为强弱接口之间的策略调整提供了进一步的灵活操作空间。

### 5.1 弱化接口宜从声调切入

汉语音节教学需要接入点是学界的固有认知，由声母至韵尾拼合的强接口理念总体符合语言的线性特点。而将接口由强调弱，却面临处理声调等的教学难题。古人的经验表明，弱接口音节教学既非完全的线性式，亦非立体式，而是线性与立体的结合。线性体现在带调音节彼此能够按顺序组合成韵律短语，立体式则是在节之上附着有声调，同时以声调的变化推动音节间的线性进程。

弱化接口后声调接入问题一直是汉语教学的难题。钱莫香（2016）发现，19世纪早期汉学家马里逊就已经认为“声调是十分次要的”。直至今日，尚有国别汉语教材中呈现音节时不标调的现象。汉语声调是汉藏语系诸语言中带调语言的典型，是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在言文分离时代，书面汉语比较重要，而如今口说汉语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书写汉语。古人弱化接口同时抓住声调的接入，这对一些学者提出弱接口教学中缺乏声调的应对恰好是一个针对性的补充。

由声调接入可以推动简化音系教学接口的优化。以四步法为例，由于忽略了声调的接入，将音节由易到难分为四个梯级则脱离了音节与意义的联系，实际上又产生了新的音节显性知识。按照本文的观点，则需保留音节的声调，在四步法的基础上进行带调音节组合，形成有意义、有韵律感的交际短句，可能更加符合学习者有意义习得的需要。

### 5.2 弱化接口应强化形式设计

蒙学阶段的语言教学，趣味性应贯穿始终，强化形式设计则是将隐性语言知识转化为趣味呈现的重要途径，从而弥补弱化接口后，缺乏抓手的教学难题。有学者指出，有意义的形式设计能够迁移教学内容，起到寓教于无声的作用（李逸与兰志华，



2018)。

强接口以显性的拼音知识接入教学，转向弱接口后，抓住什么进行音节教学的接入？这显然又是个难题。据说一百多年前中国本土教师教授外国人时有使用实物加上语音模仿的方式，以建立音节与词义的联系，这是极为受限的。古人采取有意义的形式接入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体例形式更加易于形成一个“一见即解”的模式。笔者所见《千字文》在各地的改编本中有很多都在每个字旁标注“平上去入”，以提示平仄感知规律，建立字音与雅言声调的联系。

形式设计应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更不宜使汉语音节首身分离。对泰汉语课堂上教师以双臂平直表示平声，双臂高举表示上升；教材中以小汽车行驶在平路上表示平声，下坡再上坡示意上升。而根据声调与音节的紧密关系，这种设计在形式上却存在声调与音节的首身分离现象，增加了显性知识量。就所举例子而言，教师以肢体示范声调时宜带出整个音节。而教材中的设计则可以将小汽车的图形再卡通化为音节变体，有意义的形式设计既要满足内容需要，也要恰到好处。

### 5.3 简化音节教学应区分两种顺序

学者简化了汉语音节的教学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教学过程也按照这样的设计展开。由易到难是教学常识，语言教学也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古人的经验表明，涉及到音节的教学顺序可能需要有所变通。《千字文韵》显示汉语音节的教学存在两种顺序：其一是音节本身的难易顺序，其二是随着难易而来的教学顺序。两种顺序是否要严格一致？古人给出了不同于今人的教学设计。

从前文对《千字文韵》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人并未根据其中蕴含的音节难易而进行教学顺序调整。这可能不只是简单地受到教材体例限制的原因，观察儿童语言习得对二语教学启示的学者指出，由独词到复杂组合的有意义性是儿童语言习得的根本动力（闫长虹与王敏，2019）。教学顺序上如果严格区分抽象音节由易到难的教学顺序，则可能会将音节习得的形式规范与意义动力弄颠倒了。

按照古人的经验，教师的音节教学要有内容上的重难点区分，但是在顺序上则宜于秉持难易混合的教学理念。为了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对于容易的音节在教学中要进行较为严格的监控，确保易学音节的习得，而对于混合其中的难点音节，比如采取已有的“派生法”教学而不必逢偏必究。不同于抽象的、脱离交际意义的音节教学，宜在有意义的交际中进行难易音节的教学设计。

## 五、结语

在言语交际层面，音节是汉语交际的基础原材料，是对泰汉语教学的基础。音节教学在整个对泰汉语教学中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是关涉到汉语习得全局的教学大事。同时，音节教学不仅是国别汉语教学问题，也关涉到汉语二语教学的全局。汉语音节教学面临的普遍问题是教学接口过于走强后已明显带来教学低效的难题，强弱教学接口之间的弹性受到抑制。这对于像对泰这样国别汉语教学课时极为有限的情况，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已显得比较困难，同时与市场对汉语人才的迫切需求形成了教学产出

不足的矛盾。面对这样的局面，学者主张减弱汉语音节的教学接口，比如由四拼回调至传统的二拼等（赵金铭，2008），还有的学者则进一步强调整体音节教学（史冠新，2015），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尽可能减少显性知识的应用。然而，不像教学接口越来越强的趋势，调弱的努力似乎并未达到应有状态，比如对于声调的处理就仍然是一个难题等。本文受到母语儿童语言习得对二语教学有重要借鉴价值的相关研究启发（闫长红与王敏，2019），将目光转向传统蒙学经验，希望从中寻找相关教学理念的突破。

带着今人对汉语音节教学的一些误解，本文梳理蒙学教育史发现，今人对于汉语音节教学接口日益强化的普遍认知可能源于对蒙学的某种误解。可能将传统汉语音韵学史上的学科知识嫁接到了童蒙教学领域。为此，本文将蒙学经典《千字文韵》作为具体案例，探讨其汉语音节的教学设计。该案例中，古人对雅言音节教学中由声调接入的高度重视、巧设形式迁移隐性教学内容，以及难易教学顺序的特殊处理方法，都正好切中了今人弱化汉语音节教学接口后的难点。进而本文提出，为了弥补调弱教学接口之后的抓手问题，需在声调的接入、以显性形式迁移隐性内容，以及难易教学顺序的特殊处理上进行补充优化。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弱化教学接口模式的研究。从这一角度看，本文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梳理了古今汉语音节教学接口强弱演变的规律。二是进一步推进了汉语音节教学接口的弱化研究，完善了汉语音节弱接口的教学模式，拓展了汉语音节教学上强弱接口的弹性互动空间。

本文主要就汉语音节的教学接口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限于篇幅，在具体的教学策略上还不是很具体，有待今后继续探讨。

## 参考文献

- 冯海丹 (2022)。近 25 年来泰国留学生汉语语音教学研究述评。红河学院学报, 20 (5), 140-145。
- Feng, H. (2025).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phonetics teaching for Thai students in the past 25 years.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20(5), 140-145.
- 黄雪晴 (2015)。《音韵阐微》的音系与反切改良。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Huang, X. (2015). Improvement of the phonetic system and antithesis in the Yinyun Chanwei (Doctoral dissertation, Wuhan University).
- 河野守夫 (2001)。口语识别和生成机制，東京：金星堂。
- Heye, S. (2001). Spoken language recognition and production mechanisms. Tokyo: スター・チェンバー。
- 刘英林，马箭飞 (2010)。研制《音节和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探寻汉语国际教育新思维。《世界汉语教学》，24(1), 82-92。
- Liu, Y., & Ma, J. (2010). Development of 'syllable and Chinese character vocabulary classification' to explore new thinking in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4(1), 82-92.
- 陆军，卫乃兴 (2018)。二语搭配隐性、显性知识接口关系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心理语言实验研究范式探索。《外语教学与研究》，50 (6)，885-897+960。
- Lu, J., & Wei, N. (2018). Research on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interface relationship of second language collocation based on corpus: Exploring the paradigm of psycholinguistic experimental research.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Bimonthly)*, 50(6), 885-897+960.
- 李如龙，陈瑶 (2015)。从语音特征出发设计语音教学。《学术研究》，(3)，132-135+2。
- Li, R., & Chen, Y. (2015). Designing phonics instruction from phonological features. *Academic Research*, (3), 132-135+2.
- 吕必松 (2008)。再论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数字化汉语教学进展与深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Lü, B. (2008). Revisiting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 language. In Progress and deepening of digit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 李静宜 (2022)。基于感知单元理论的日语听力语音加工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 (4), 92-103。
- Li, J. (2022). A study of speech processing in Japanese listening based on perceptual unit theory.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and Research*, (4), 92-103.
- 李逸, 兰志华 (2018)。形式先于内容·认同重于认识·经验优于故事——清单式教学内容的课型设计。《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35), 64-68。
- Li, Y., & Lan, Z. (2018). Form before content—identification over recognition—experience over story-lesson design for list-based cont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ching Reference of Middle School Politics*, (35), 64-68.
- 钱奠香 (2016)。马礼逊“重汉字形义, 略汉字读音”汉语观分析。《国际汉语学报》, 7 (1), 166-175。
- Qian, D. (2016). Analysis on Robert Morrison's viewpoint about Chinese languag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while less on the exact pronunc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7(1), 166-175.
- 苏映仪 (2025)。拼音知识和语音意识对泰国儿童双字词阅读流畅性的影响。南宁: 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Su, Y. (2025). The impact of pinyin knowledge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on the fluency of Thai children's biliteracy reading (Master's thesis, Guangxi University).
- 史冠新 (2015)。汉语语音音节本位辨正。《东方论坛》, (5), 12-17。
- Shi, G. (2015). Distinguishing syllable-based units in Chinese phonetics. *Eastern Forum-Journal*, (5), 12-17.
- 唐东旭 (2020)。二语习得中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发展及教学运用述评。《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33 (4), 121-126。
- Tang, X. (2020). Development and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review.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3(4), 121-126.
- 吴峰 (2019)。泰国汉语教材研究。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Wu, F. (2019). Research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ailand. Beijing: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ress.

汪周坤 (2019)。《三字经》泰国教学实践探索。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Wang, Z. (2019). 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in Thailand (Master’s thesi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王洋，张琦 (2023)。基于字本位理论的国家通用语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探索。《语言与翻译》，(2)，75-80。

Wang, Y., & Zhang, Q. (2023).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l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ord. *Orientatio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2), 75-80.

袁芳远 (2017)。汉语二语的显隐性知识、显隐性教学及课堂研究。《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2 (2)，41-51。

Yuan, F. (2017). Explicit and implicit knowledge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xplicit and implicit teaching, and classroom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2(2), 41-51.

杨绪明，马一鸣，杨捷 (2023)。国际中文教学版《汉语拼音方案》可行性思考。《汉语教学学刊》，(1)，86-97+180。

Yang, X., Ma, Y., & Yangjie. (2023). Feasibility thinking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Version of “Hanyu Pinyin Pla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1), 86-97+18.

闫长红，王敏 (2019)。Tomasello 的语言习得理论及其对二语习得的启示。《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7 (1)，86-89。

Yan, C., & Wang, M. (2019). Tomasello’s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LA. *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27(1), 86-89.

张冬雪 (2021)。对泰汉语教材《天天汉语》本土化编写与适切性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Zhang, D. (2021). A study on the localisation and relevan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 ‘Everyday Chinese’ to Thailand (Master’s thesi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周正，陈玉琳 (2025)。对外汉语教学类论文综述研究——以“THAI JO”网站为例。《国际中文教育期刊》，5 (1)，154-165。

Zhou, Z., & Chen, Y. (2025). A review of papers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aking the “THAI JO” website as 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5(1), 154–165.

赵金铭 (1985)。简化对外汉语音系教学的可能与依据。《语言教学与研究》，(3)，62-75。

Zhao, J. (1985). Possible and rationale for simplifying the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to foreign learner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3), 62–75.

张美兰 (2022)。北京官话《语言自述集》成通用类汉语教材动因探究。《汉语教学学刊》，(2)，40–48+167–168。

Zhang, M. (2022). The motiv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Beijing Mandarin “Yuyan Zierji” into a general category of Chinese textbook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2), 40–48+167–168.